

开”、“责任说明”、“对话”。

但是到了战后，特别是60年代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日本留学生大量增加，以及伴随着资本自由化而逐渐增加的人才的国际流动，日本与欧美各国在学术方面的交流急速增加，上述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欧美学术界的既存学术成果基本上已经像今天这样，被日本学术界所熟知，与此相应，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被欧美学术界了解的情况也逐渐增多，“由横变竖”的剽窃式研究慢慢就不再通用了。这时日本人的欧美研究当然也就被要求对研究对象国的“验证程序”了。这一点在日美间的学术交流中最为明显。

而在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地区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日本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并不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此造成了容忍像过去欧美研究中出现的“由横变竖”（在中国研究里就是将汉语翻译成日语）式研究横行的局面。现代中国研究也不例外。但即使同样是“由横变竖”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欧美研究中的这种弊端和“地区研究”领域中的弊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当时的欧美研究是以欧美的学术水平高于日本为前提的，而“地区研究”则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水平视为低于日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剽窃式的研究。

(9) 中日两国教育和研究交流中的问题：学术教育领域的分层性

到了今天，随着国际间人才流动的频繁，尽管欧美研究特别是日美研究交流中“由横变竖”式的剽窃性研究已经难以容身了，但是在“地区研究”领域中，这种剽窃性研究仍然有一定市场。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研究者看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水平，并倾向于不承认在其研究中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说，由于并没有认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与自己的研究处于同一水平之上，所以不是将其视为学术性的参考和探讨对象，而是作为信息资料般的研究材料，并随之根据情况不自觉地进行“剽窃”。这一点在日本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留学现状中也鲜明地反映了

出来。

包括中国在内，抱着学习和取得学位目的赴日留学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近年来快速增长，尽管如此，以同样目的留学发展中国家的日本留学生却少之又少。⁵⁵就是说，尽管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与物的国际交流非常频繁，从留学的角度看，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摆脱单向流动的性质。

同样的情况当然在学术交流中也有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各个领域的很多日本学者前往中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为那里从事日本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举办关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讲座或者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种理论的讲座，从事研究交流活动。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还没有培养日本学人才的完善系统的情况下，这些讲座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可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交流访问，几乎所有的讲座都是没有翻译而直接用日语进行的。⁵⁶

反过来看，中国学者被邀请到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举办讲座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通常都是被要求带有翻译的。特别是一年以上以举行讲座和讲义为前提的中长期访问交流，被招聘的中国学者精通日语成为必要条件，而不会日语的学者往往就不受欢迎。

这种状况如实地反映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水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在其学科理论（discipline，学术工具、理论和分析的理论框架）上有一种强烈的偏向，就是并不期待通过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产生相互影响。比如对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各种问题的学术性分析和见解，被认为与其他类型的中国信息一样，仅仅是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资料，此外没有其他的意义，看不到学术和理论价值。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实际情况就是，其学科理论与其说是在日本学术界内部的讨论，不如说更倾向于吸收更多的美国学术界的议论。而且这不是本着日美两国学术界相互

平等的双向性关系通过相互影响进行吸收的，而是日本研究者单方面接受来自美国学术界的各种理论观点，不能不说基本上是单向性的。在这里将学术性学科理论的水平分成了金字塔形的多个层次(hierarchy)，把美国的学术界置于顶点，其次是日本和西欧各国，再下面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

今天，很多的中国学专业的日本学生和研究者，在相当程度上熟练地掌握了中文日常会话，这也反映了以经济贸易为中心的中日交流实务层次上的盛况。但是如果涉及到学术层次的对话和讨论所必须的高水平的中文，能力还是极端匮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受邀来日的中国学者如果缺乏日语和英语能力，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就不太可能接受的理由就在于此。很明显，认为中国的学术界没有“值得学习”和“值得称之为理论”的地方，造成了对学术性对话必要的学术层次的中文练习的轻视，这也受到了日本学术界根深蒂固的对华评价的影响。

结果是，作为“地区研究”一部分的现代中国研究，在积极从事在中国的社会调查(fieldwork)、访谈及搜集信息资料和研究素材等工作的同时，却抱有并不在学术交流上充分留意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倾向。⁵⁷这一点也正是现代中国研究中轻视采用“验证程序”、很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纵观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可能会对是否都具有上述倾向这一点产生疑问。因为一部分意见认为文革时期日本的中国礼赞式研究倒是发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⁵⁸

但是礼赞性研究如果真的认为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到“值得学习”的地方，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大学处于封闭状态的时期之外，理应出现日本的青年学生踊跃前往中国大学进行“学术留学”的现象。可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日本的日中友好访华团频繁访华，但教育和学术交流却几乎没有。总体上可以说包括文革期在内，战后直至今日，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留学”的日本学生人

数极少，几乎都只止步于“语言留学”的阶段。与此相对照，战后日本赴美留学是什么情况呢？加上福布赖特奖学金的关系，赴美“学术留学”的情况一直占绝对优势，大多数留学生都将取得学位作为留学的目的。

这说明，即使在文革当时的中国礼赞性研究中，也没有在学术层次上把中国看得很高。就算是当时存在着中国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评价，但也只是在与学术领域不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践运动层次上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而已。

比如说文革期间，因中国礼赞派出名的菅沼正久和山内一男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就出于理论斗争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价值关系”和“劳动价值学说”问题上与对中国持批判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岗稔和副岛种典等进行了相当精密的争论。但是很明显，在这场论争中，来自中国国内的观点并没有被当作学科理论，而只被作为论争的材料，完全没有期待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相互对等的理论探讨的迹象。⁵⁹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上中国不如日本的成见影响很大。

(10) 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问题

从这种现状就不难想象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第一个方面就是，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现状的诊断(因果论分析)，原则上并不是以对中国现状进行直接“治疗”为目的的。依据这种诊断而下的药方，除了有一小部分作为建议的形式被中国决策当局所采纳外，大部分只是以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对华政策、对华交流的治疗方法(制定新政策和修正旧政策)为目的的。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中国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上述现实目的与自己的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的目的，以及对与其成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日本社会各界应该采用的“信息公开”、“责任说明”